

逝言翻譯中 (In Flow of Words)

影片介紹

由荷蘭導演伊莉安·艾斯特·博茨 (Eliane Esther Bots) 執導的《逝言翻譯中》，以法庭口譯員的視角，藉由中立、客觀且不帶任何情緒的口吻，重述曾在國際刑事法庭中所看見的一切。口譯員以自身經驗與面臨的創傷，一步步回溯前南斯拉夫種族滅絕與人權的侵害事件，揭幕過去的殘忍真相。

雖已事隔30多年，痛苦的記憶仍深植於口譯員的一生。受害者家屬、證人、被告的口供至今不停盤旋於腦海，在此部片中，他們終於能開口為亡者發聲。從毫不起眼、擔任中立角色的傳達者——口譯員，透過他們的視角回望發生於1990年代前南斯拉夫種族滅絕與屠殺，如何讓人們正視那些身處於亂世而被輕易犧牲的逝者，回望曾經歷的歷史，並透過轉型正義，共同走向未來。

司機載著將死的小孩們，和他們在車上一起唱歌；醫生將隱密的殘暴酷刑偷偷錄影，避免有人說這一切未曾發生；兩個年幼的小孩被送到集中營後不再回來；穆斯林知識份子被帶到廁所雙雙打死……。這些亡人、受害者家屬、證人們的口供，一次次地旋繞於通譯員的耳邊。藉由《逝言翻譯中》，亡人假藉通譯員之軀，找回他們被亂世埋葬的靈魂。

背景介紹：前南斯拉夫「雪布尼查大屠殺」

「我們曾看過一個影片，關於塞爾維亞軍隊強迫一個穆斯林囚犯，和躲在鄰近山丘的穆斯林人們大喊與溝通，他向那些人喊著：『來吧，來這裡吧，這些塞爾維亞人不會傷害你們、對你們做任何事，不要擔心，過來吧！』我已經看過那部影片 7 次了，而且我知道這個大喊的男人和其他躲藏在山丘裡的人們的墓在哪裡。我有些窒息，接著我把麥克風遞給同事，

因為我想要大哭。」一位通譯員以緩慢的口白訴說著。

此片自前南斯拉夫地區種族滅絕與屠殺事件出發，其惡名昭彰的程度被稱為「雪布尼查大屠殺」（Srebrenica massacre），發生於 1995 年 7 月的「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」（Bosnia and Herzegovina，簡稱波赫）雪布尼查地區，造成大約 8,000 名當地平民死亡，是繼二戰之後，發生在歐洲最嚴重的一次屠殺行為。後位於荷蘭海牙的「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」將此次屠殺定性為種族滅絕，其後國際法院也確認為種族滅絕。

「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」（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）是一個存在於 1945 年至 1992 年的巴爾幹社會主義國家聯邦，由馬其頓、塞爾維亞、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、克羅埃西亞、斯洛維尼亞、蒙特內哥羅等 6 個社會主義共和國所組成。它是一個奉行聯邦制的多民族國家，直至 1980 至 1990 年代，隨著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衰退、民族主義的重生與東歐民主化，南斯拉夫各組成國之間的矛盾逐漸激化。民族間的不和、排斥及分裂，伴隨著暴力，火苗隨之燃起。

前述提及的「波赫」即是在 1991 年 10 月 15 日宣布獨立，雖後獲得歐洲共同體（歐盟前身）與美國的承認，但波赫境內的其中一個自治共和國「塞族共和國」不願將原屬於該國的地區分離出去，於是從 1992 年始在該地屠殺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人（簡稱波士尼亞人）。「塞族共和國」原和「波赫聯邦」以及聯邦中一特區「布爾奇科區」共同組成「波赫」，「塞族共和國」原本擁有自己的政府、議會、軍隊和警察部隊，因不滿於土地的分割，因此展開殺戮。此外，片中多次提及穆斯林被屠殺，暗示了種族屠殺背後的宗教衝突。

面對此巨大的集體創傷，經過歷史的沖刷，更須透過轉型正義，一針一線地修復早已傷痕累累的社會，而非抹煞還未撫平的瘡疤。在轉型過程

中，「國際刑事法院」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，作為仲裁關乎種族滅絕、危害人類、戰爭罪的全球性法庭，它的判刑給予了那些千千萬萬被壓迫、屠殺與虐死等承受非人道苦難的人們，一個解開冤屈的機會，更藉此認定了這些罪行應被國際集體撻伐，且需受到全人類的共同譴責。

（詳情請進一步參考本段落節錄引用之維基百科「雪布尼查大屠殺」條目）

探討議題：大屠殺後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（PTSD）

法庭通譯員一般被理解為在法庭中扮演溝通管道一角，亦即需要雙語能力，為不通曉另一語言的人翻譯。法庭通譯被要求不能修改、摘錄、省略、增加原語句的字詞與意義，需精確將訊息轉換為其它的語言。大眾期待法庭通譯中立、專業，成為人們所熟知的「傳聲筒」，僅僅作為一個為順暢溝通而存在的橋樑。但在《逝言翻譯中》一片當中，這些通譯員不願再被「傳聲筒」的角色束縛，他們選擇道出縈繞已久的恐懼與悲痛，那些迫使他們從夢中驚醒的逝者的畫面、受害者道出慘痛經歷的聲音，早已深埋心中許久。

在《逝言翻譯中》中，我們可從通譯員的言語和態度當中，看見潛伏他們心房的創傷，有些可能早已罹患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」（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，以下簡稱 PTSD）。PTSD 意指人們在經歷重大創傷之後，所罹患的嚴重壓力症狀。罹患 PTSD 者不一定是親身經歷造成創傷的事件，而只要是曾目擊、經驗、或被迫面對一或多種事件即可能罹患此症狀。當這些受害者家屬、目擊者、甚至被告，在「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」上將屠殺期間所看見的畫面、經歷的過程仔細地一一描述出來。這些通譯員都透過耳機，親耳聆聽了暴力的發生。

針對因政治創傷罹患 PTSD 的病患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（以下簡稱

促轉會)在2018年至2022年間便開始啟動「政治暴力創傷療癒與平復」相關工作，促轉會透過與受難者與家屬深度訪談以及全國性的電話關懷，進一步深入了解過往國家政治暴力對受難家庭所造成無形傷害，與受難家庭的照顧和心理療癒需求。

2022年5月31日，隨著促轉會任務結束解散之後，該項工作便移交至衛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，重新扶持、建立在威權統治時期，國家曾運用不法行為剝奪的基本人權。而此決策於2022年中才正式上路，其效果仍待發展。作為治療政治創傷的起點，雖大多受害者早已去世，但遺留下來的家屬們卻得承受長久且難以撫平的心理壓力，往往在精神上遭遇空白、折磨、失憶等症狀。轉型正義仍需運用長時間的諮商、輔導與陪伴，使個人在龐大的國家巨獸體制下，不至於被快速吞沒。

在這法庭中，通譯員消除了語言的隔閡，讓不分種族、性別、年齡、階級的所有證言都能在法庭上被平等地看見、平等地對談。

聚焦臺灣：反思國語政策以及如何保障弱勢語言的受害族群

「霧散了，景物終於清晰。但是，為什麼都含著眼淚？」——《超級大國民》受政治暴力創傷影響之人不一定是直接受到肉身暴力，無論是國片《香蕉天堂》當中飾演「外省人」的翁門栓，在身分上的長期剝奪；或是《超級大國民》裡成天說著腦袋被政府裝電子偵測器，精神難以恢復健康的許毅生，這些角色投射出的臺灣歷史創傷，更可見得在威權體制之下，受害者可能受到當局的言語暴力、心理上的虐待、身陷牢獄而無法與外界聯繫的內心失落等。這些無形精神層面的種種打擊與折磨，是無數受害者深陷政治暴力創傷陰影的緣故，也是創傷療癒需被重視的原因。

德國哲學家班雅明（Walter Benjamin）曾說：「說故事的人，透過他的故事裡溫柔的火焰，使得他生命的燈蕊，燃燒殆盡。」而療癒受歷史創

傷之人，就如同以溫柔撫慰之姿，一再重述那些被隱沒的故事，直到景物逐漸清晰。

在臺灣，中文成為「國語」，可追溯至1946年國民政府接管臺灣後成立的「臺灣省國語推行運動委員會」所制定的「國語政策」。國語政策以北京官話（中文）作為標準「國語」，從字典、課本、文學等教育系統，一步步地促使「國語」固定化。語言的統一，潛移默化地整合人們對新掌權政府的認同，同時更硬生生地壓迫了臺灣本土語言（包括臺語、客語、原住民族語）、日語持續發展的空間，造成當今本土語言在世代之間的嚴重斷裂。

威權統治時期，為了強化北京官話的權威地位，說「方言」成為羞恥的罪孽。尤其在威權統治的司法機關之下，語言的霸權化，造成人們在爭取權益時產生不平等的現象。為了追求獲得公平正義，人們被迫接受「國語」的大舉侵入，也使本土語言趨於弱勢語言。語言作為根深蒂固的溝通媒介，當人們不會說國家的語言時，在權益的爭取上從出發點就已削弱了一半。當我們無法說出流利的「國語」，當人們無法從語言伸張冤屈，何來的公平正義？

另一方面，隨著臺灣解嚴且逐漸民主化後，社會運動與多元理念倡議獲得較多的空間發聲，母語運動於焉展開，為本土語言帶來了一線生機。但威權政府力推的國語政策，使本土語言漸漸消逝於日常生活中，導致了不同語言使用上的嚴重斷層。長期打壓本土語言、獨尊「國語」的結果，便是新生代失去自然使用母語的環境，不會說，甚至聽不懂。這是一場臺灣本土母語的浩劫。

2019年臺灣終於制訂《國家語言發展法》，以此宣示正視多元語言的重要性，國家拓展國家語言的定義，將於友善環境中學習、使用多元語言

的權利歸還於公眾。臺灣對於語言的轉型正義自始積極地開展。

延伸閱讀：

陳培豐（2021），《「同化」的同床異夢：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、近代化與認同》。臺北：麥田。

潔絲米拉·茲巴尼奇（2021），《阿依達的救援行動》。